

易 風 傳

刘维颖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易 風 傳

刘维颖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易风传 / 刘维颖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203 - 08811 - 0

I. ①易… II. ①刘… III. ①王易风(1914 ~ 2003)—传记
IV. ① K825.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303058 号

易风传

著 者: 刘维颖
责任编辑: 翟丽娟
装帧设计: 刘彦杰 赵 婷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1.25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1 - 630 册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8811 - 0
定 价: 7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精神不朽 风范长存（代序）

山西戏剧研究所

2003年4月23日，山西省戏剧研究所离休干部王易风同志，以其九十高寿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历程，悄悄地含笑离开了我们。他，没有让家人为他组织追悼会、遗体告别仪式，也没有惊动周围的同志，甚至包括他远在外地的子孙。也许是这个缘故吧，后来人们从口口相传中得知易风老已离开人世的噩耗后，不少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这是真的吗？”的疑问。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易风老是一位资历颇深的革命先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是一位风趣、诙谐、幽默且硕果累累的文艺大家。这样一位受人敬重的老人怎么竟会悄无声息地走了呢？

后来，当人们证实易风老的确已驾鹤西去离开我们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他悄然与世长辞、后事从简的用意：他，不愿炫耀自己，更不想麻烦他人。充分体现了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战士的高尚情操，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的博大胸怀。正是这个原因，时至今日人们仍会想起他。而每当想起他的时候，一位精神矍铄、扶杖含笑的老者形象又会浮现在我们眼前，渐渐地高大起来，而且越来越明晰，并深深地印在人们心里，使人永远难以忘怀，难以忘怀对他的敬仰之情！

（一）

王易风同志是山西省临县人，民国三年（1914）出生在一个耕读传家、生活殷实的家庭，初名王国昌，行三。他的祖父、父、兄皆习孔孟，却又都

没有离开过晋西那片厚厚的黄土地，靠在贫瘠的土地上辛勤耕作维持生计。他出生时，虽然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已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民国伊始，但地处晋西边远山区的临县，几千年封建专制遗留下来的沉重积习并无多大改变，在他求知的初期，首先接触到的书本知识仍然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传世经典，听到的训言也多是孔孟之道。所谓新的东西虽然也渗透到了临县，但与旧的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也许是他的天赋，也许是他的勤奋，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他的学习成绩受到了当地人们的赏识。于是，当他刚刚16岁（1930）的时候，附近村庄慕名请他前去教书，并且兼任了编村中心小学的主任。就这样，他吃着农村的粗茶淡饭，穿着朴素的补丁衣衫，开始了向远离大城市的孩子们传授知识的生活，尽心尽力地度过了十个春秋。这是一段枯燥乏味的生活，但对王易风来说，却是自食其力生活的开始，是涉足纷繁社会的起点。

1940年，在全国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烽火中，古老的临县迎来了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一个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了王易风面前。人民政权之所作所为，使他对共产党、毛主席充满了敬仰之情，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未来的事业充满了信心。这时候，他虽然并未确定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一桩桩一件件活生生的实事，却使他对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产生了坚定不移之信念。于是，充满朝气、血气方刚且有一定文化素养的王易风，除了继续完成好他教学的本职工作，还凭着自幼就酷爱民间艺术的天性，又兼上了业余剧团的团长。

1941年秋，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奉命离开了从事12年之久的教书育人岗位，正式调到了专署文工团，开始了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革命文艺工作。1942年秋，文工团改编为吕梁三分区湫水剧社，他成了既当演员又做编导，还搞剧务的不可缺少的文艺骨干，演唱晋剧、眉户，说莲花落、打四块瓦，他都能拿得起来放得下，于是很快便成了偏僻的吕梁山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名人。无论在沟壑纵横的山区，还是硝烟未尽的战场，只要是慰问前线战士、向群众进行宣传，他都是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到处可以听到他说唱的声音，到处可以看到他不知疲倦的身影。这时候的王易风，简直就是一匹精

力充沛驰骋不息的骏马，哪里最艰苦，哪里需要他，他就会出现在哪里！

经过四年的艰苦拼搏和血与火的洗礼，王易风在他熟悉的黄土地上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没等他喘息一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了新的内战。作为革命文艺战士的王易风，面对现实，他把满腔的愤恨化作了行动，凭着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一双磨不破拖不垮的铁脚板和一身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才华，又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

作为一名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小知识分子，王易风经过这一段不寻常岁月的磨炼，从无数革命先烈洒下的血泊中，早已看清了中国的出路，他对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已由自发拥护变成了一个坚定的追随者，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已经具备了一名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的基本条件。于是在1946年的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王易风新生命的起点，从那时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只要是党和人民需要的，他就去做，就要千方百计地把它做好，即使困难再大，也决不退缩。1946年秋，已和湫水剧社一起转入吕梁军区吕梁剧社的王易风，突然接到晋绥边区文联的调令，要他到文联所属的影剧队去主持工作。所谓影剧队，实际就是演木偶皮影戏的宣传队，仅有十来个成员。王易风虽然自幼爱好民间艺术，但却从来没有亲自弄过木偶皮影，如今要让他去主持这一陌生工作，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没有向组织上提任何困难与要求，愉快地上任了。他凭着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执着，一到影剧队就带领这支小宣传队，冒着随时都可能与敌人遭遇的危险，走临县，到离石，下孝义，过文水，进交城，不知翻过多少山岭，越过多少沟壑，每到一地即白天演木偶，晚上弄皮影。每场演出前又加上了由他根据当时当地发生的新人新事编写，并亲自表演的莲花落、小快板等新的说唱节目，比如《蒋介石下山摘桃子》、《拥军模范》、《区长抬担架》、《三斤红面》等，就是由他编演并深受观众欢迎的节目。

由于整日马不停蹄的奔波，超负荷的工作，他终于病倒了，得的是可怕的伤寒，病重时水米难进、昏迷不醒。就在他大病期间，他首先想到的是不给周围的同志添麻烦，征得领导的同意，由他四弟将他接回到了故乡。

经家人的精心照料，他的病奇迹般的好了。当他死里逃生刚刚恢复健康的时候，他没有留恋温暖的小家庭，又毅然告别了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的妻儿，回到他的战斗岗位，沿着他认准了的革命道路，开始了他人生价值的新的追求。直至迎来了太原解放，新中国的诞生。

太原解放后，王易风同志随晋中文工团进入省城。不久，晋中文工团改制为太原市文工团，继而更名为山西省文艺工作一团。他以文工团文美组长的身份深入厂矿采访新人新事，紧密配合恢复生产，建设新城市及时编写说唱节目。1950年底，王易风同志调离文工团，参与山西戏剧工作者协会筹建工作，任编审科长。后又调山西省文教厅文化处戏曲改进科任副科长，并作为山西省三位代表之一，赴京参加了全国首届戏曲工作会议。回省后，根据中央“三改”（改人、改戏、改制）政策，在全省开展了新戏剧运动，他领导并亲自参加省城各戏班的“三改”工作。易风同志深知戏曲艺人在旧社会的卑贱地位，通过“三改”，更具体地了解戏曲艺人在旧社会受歧视，受压迫的悲惨身世。在那极“左”的年代里，他不怕风险，仗义执言，写出《艺人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一不同凡响的文章，在《山西日报》上发表，捍卫了戏曲艺人的尊严和劳动价值，在戏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山西省文化事业管理局成立后，王易风同志转向行政工作岗位，先任文化局艺术科长，继任艺术处长。他以饱满的热情、积极严密的工作作风和态度，组织和筹建文艺团体，参加了全国、全省的戏曲会演、民间文艺会演等多次重大艺术活动，忠实地执行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在繁杂的行政工作之余，他结合戏曲工作的需要，写了《戏改工作中一种制度之研究》、《认真解决戏改中的几个问题》、《戏曲配合政治任务，不能违反历史现实》、《识宝、取宝、用宝》等针对现实的指导性文章。同时，参与改编了首部晋剧戏曲艺术片《打金枝》，创作了历史剧《石达开》和现代题材戏曲《细水长流》、《久旱逢甘雨》等剧作。

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7年间，全省戏剧工作的每次重大举措，都洒下了王易风同志辛勤劳动的汗水和心血。

提起王易风同志对党的文艺事业的贡献来，当以在戏剧研究领域的贡献

尤为突出。如果说他在 71 岁之后调回山西省戏剧研究所，广收博采，厚积薄发，全身心投入调查研究，埋头史志，著书立说，培育后学的近廿年是其从事戏剧研究的丰收季节的话，那么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文化大革命”，他主持山西省文化局戏剧工作研究室工作期间所付出的艰辛和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是他为山西戏剧研究事业夯实基础，营造框架的奋力耕耘期。这个黄金时段，虽然过早地被“文化大革命”的阴霾所淹没，但阴风过后的璀璨光辉，依然沐浴后人，影响至深。易风同志的确在原省文化局直属业务大室——戏剧工作研究室的创建和发展中，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组织才华和不拘一格、知人敢任的过人胆识，以及身先士卒、全盘驾驭综合艺术科研的超凡能力。每忆往事，令人回味无穷。当年在易风先生麾下，集结了一批学有所长的老、中、青文化人才，从戏剧编导、音乐舞美、脸谱服饰、音像摄影，乃至资料档案等方面，全方位开展了充满生机的扎扎实实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短短的几年中，录存抢救了大批珍贵资料，出版了一批书刊著作，购置了一批专业图书，有家底，有人才，工作有声有色；老年人提携后进，传授知识；壮年人著书立说，成果骄人；青年人埋头苦读，奋发进取。这个良好的学术氛围，便是在王易风同志以其朴实无华的人格魅力和充满亲情的领导艺术的影响和培育下形成的。易风同志营造的敬业之风与治学气氛，可以说影响了几代人，至今遗风尚存，流播后世。称王易风同志是山西戏剧研究工作的优秀奠基者，当之无愧。

“文化大革命”中，易风同志饱受住牛棚、挨批斗之苦，1970 年，他被下放到物质和文化极为贫乏的吕梁山区。虽然身处逆境，尽管因艺招祸，但表面随和，而内心执着的易风同志却没有因此而心灰意冷，更没有一蹶不振。他对党的文艺事业一片痴情丝毫未减，他蓄势待发，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之后，随着形势的逐渐好转，他先后担任了临县革委会政工组副组长，吕梁地区第一任文化局长，吕梁地区第一任文联主任等职务，他的领导才能和艺术才华又一次得到了展示机会。当时，吕梁是一个新建的地区，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白手起家。易风同志深感责任重大，他不顾体衰多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搞调查、定规划；他办刊物，建艺校，抓创作，育人

才；他还亲自动手，写诗歌、撰唱词，编快板，并亲自登台演唱，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总之，易风同志为吕梁地区文学艺术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85年，时年71岁的王易风同志调回山西省戏剧研究所，他虽办了离休手续但没有郁郁寡欢，烦躁不安，更没有患什么时髦的“离休症”，正如他在一首诗中表白的那样：“古稀壮志依然在，为守春秋再挥毫。”他老当益壮，离而不休，“不须扬鞭自奋蹄”，很快投入到《中国戏曲志·山西卷》这一国家重点艺术科研项目的浩大工程的编纂工作中，并被委以副主编的重任。除分工负责“机构”、“演出习俗”、“轶闻传说”、“传记”等部类条目的编审工作外，还亲自撰写了“中路梆子”剧种、“打金枝”剧目、丁果仙、冀美莲等演员传记条目释文。为了达到志书体例所严格要求的资料翔实、文字精练、记事准确，年逾古稀的易风同志，仍然经常扶杖出访调查，东至阳泉、平定，西至陕西榆林、佳县、绥德，南至灵石、石楼，北至内蒙古的包头、呼和浩特，河北省的张家口，都留下他艰辛奔波的足迹。他的这种为历史负责，为后代负责的责任心及不辞辛劳、求真务实、扎扎实实做学问的治学精神，为大家树立了学习榜样，成为全体编纂人员埋头苦干、 ze 工作的强大动力。

1988年盛夏，《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处于最后完成送审稿的关键时期，根据总编辑部特约编审员的意见，需要将100多万字的初稿再大改一遍，为了按期完成修改任务，编辑部的全体人员采取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统一集中在城郊外某部队的一个简陋招待所里，关门奋战四十天，夜以继日加紧工作。王易风同志当时是74岁的高龄老人，不顾酷暑，边服药边审稿，同年轻人一道，连续作战。这种可贵的敬业精神和吃苦精神，激励着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终于圆满完成了山西卷的编纂任务，于1990年通过终审正式出版，成为全国率先完成的“先行卷”之一，多次受到文化部表彰。王易风同志先后被评为全省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先进工作者，并荣获文化部和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发的全国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编纂荣誉奖和编纂成果一等奖。可以说，100多万字的山西卷，不是用

笔墨写成的，而是包括王易风同志在内的编辑部全体人员的汗水、心血铸成的。

人逢盛世，精神焕发。改革开放以来，王易风同志进入耄耋之年，但也是他笔耕半世的丰收年。他离休以后的十几年当中，除积极参与完成《中国戏曲志·山西卷》外，并相继出版了四部共100多万字的专著和文集。1991年出版了《山右戏曲杂记》，1994年出版了《山乡诗话》，1996年出版了《艺苑熟人往事》，2001年出版了《王易风剧作选》。同时还满怀热情地提携后辈，为《梨园夜话》、《晋剧优秀唱段》、《张有洛曲艺选》、《程玉英传》等八部专著写了序言，参与创作、修改电视剧《于成龙》、《红军东征》，特别是对原在本所史论部担任主任的张林雨同志的两部学术著作《晋昆考》、《山西戏剧图史》，从课题选定、篇章结构、资料筛选到资金筹措，进行了全过程地悉心指导和具体帮助，并提供了自己多年积累的素材和图片资料。王易风同志为《山西戏剧图史》这部250万字，3000多幅图片的鸿篇巨制，倾注了他晚年的心血。易风同志的晚年是硕果累累、事业辉煌的晚年，是提携后学、甘当人梯的晚年！

(二)

王易风同志在文艺战线上工作、战斗了60多个春秋，涉及说、唱、写、编、导、演诸多领域，其中体现在曲艺、戏曲、诗文方面的成就更风韵独特、别具一格，令后人敬服。他平生的著述，有的散失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有的毁损于“文革”时期，留存下来的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著作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山右戏曲杂记》、《艺苑熟人往事》、《山乡诗话》、《王易风剧作选》等专著。此外尚有汇集在《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山西剧种概说》等书中的不少文字。另外还有发表于各类报刊上的小戏、曲艺、杂谈、随笔多种，累计有数百万字。他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说是硕果累累。看了这些，也许有人会问，一个从战争年月走过来的普通文艺工作者，一个整日身陷行政事务圈子里的人，怎么会取得如此显

赫的成就呢？难道是他的天才所致吗？

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他具有超常的记忆力，年轻时还有清亮悦耳的好嗓子，但这绝不是他取得成就的根本。因为“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而是由可以是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王易风所谓的“天才”也正是这样来的。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他与曲艺、戏曲的情缘。

我们知道，王易风同志出生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耕读世家，成长在一片曾经孕育过中华民族古老文明，有着丰厚文化积淀的黄土地上。从他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黄河的涛声就在日夜教他唱歌，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民间艺术就在对他熏陶。所以当他年龄稍长，在打造坚实古文基础的时候，已经不知不觉地融入了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当地民间艺术的海洋。于是听说书、看大戏、闹秧歌便很快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因此成了享誉一方的有文化的文艺骨干。这无疑对他后来从事文艺创作、研究并取得成就，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不过那时候他对民间艺术仅仅是爱好、迷恋，或者说是一种兴趣。他引以为自豪的还是那不受风吹雨淋、温饱有靠、受人敬重的教书生涯。因此，1941年秋当他被正式选调到专署文工团当演员，专以文艺为职业的时候，他愕然了！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古往今来爱好艺术者虽大有人在，但从艺者却无不被人视作“下贱”之人，尤其是从事民间艺术的人更为世人所不齿。如今自己就要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了，怎能不思绪万千呢？不过他没有止步，更没有退缩。因为他坚信一心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坚信共产党指引的路是不会有错的。他勇敢地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将以往被人单纯视作消遣娱乐形式的文艺，当作了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武器，开始了他人生历程中新的战斗生活。

1943年，当他将近而立之年的时候，他如获至宝地读到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白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就是革命的文艺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必须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方向明确了，眼界开阔了，他的思想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由于当时物资异常匮乏，他所在的剧社常年活跃在吕梁地区的山山水水之间，所以他选择了为当

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说莲花落、打四块瓦的曲艺形式，用当地人民最熟悉的语言，去反映发生在火热斗争中的新人新事及人们最关心的事件，随时编写，随时说唱，短小精干，十分感人。既活跃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推动了党的中心工作的开展。而这种强烈的宣传效果反过来又给他增添了新的动力，激励他奋笔疾书，再谱新篇。此时，古老的民间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很平常的农民语汇显现出了它无穷的号召力。比如 1944 年他编演的秧歌段子《破除迷信》：

大年初一忙得很，
一早起来就敬神；
点香烧表好一阵，
究竟不知为了甚。
纸纸糊成牌位子，
不会动弹不会说；
献上枣山它不吃，
为甚给他把头磕？

一进庙门就下跪，
神像泥胎笑嘻嘻；
里面干草外面泥，
银粉刷了一层皮。

关公手提青龙刀，
挡不住敌人把庙烧；
财神爷手拿假元宝，
跪上三年也发不了。

代
序

这段秧歌用的就是当地流行的秧歌曲调和明白如话的大众化的语言，在

好听、好懂、好记中唤起观众去对照自己，去自然而然地认识自己的愚昧无知，进而自觉自愿地去与封建迷信决裂。比起单纯的政治说教，其效果不知要好多少倍。

再如写于抗战时的小段《劳军场上》，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未曾开言笑嘻嘻，
给大家报个好消息：
六区的民兵定巧计，
地洞洞挖了十几里，
直挖到石门堰炮楼底。
炸药放进去三千几，
轰隆一响惊天地。
洋鬼子坐上土飞机，
大太君踏上登云梯，
掉下来摔成几堆泥！

类似这样的作品他当时编演过好多，可惜大部分已经散失了，只能在他的《山乡诗话》中寻觅到很少的一些。

这些作品是诗，又似画，如果你是个善于作画的人，一定会依据诗意勾画出一幅幅有趣动人的画图。难怪当时的群众喜欢它！可见此时的王易风已经由一个出身于农民小知识分子家庭的人，转变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位真正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新文艺工作者。后来他回忆自己的曲艺生活时曾饱含深情地写道：曲艺“以优美的民间语言，来反映民间的各种生活，能够深入到工农兵最基层群众之中，能使文化很低甚至是文盲听众，自觉自愿地接受他的宣传，从而享受他有权享受的这种文艺生活，能够起到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代替的文艺宣传作用”。这就是他所以热爱曲艺艺术的真实原因。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渐渐地不再去当众说唱了，但每当有触动他灵感的事件发生，他仍然要编写几个段子，用

的还是那朗朗上口的群众语言。例如发表在1958年《文化周刊》上的《饲养员之家》，其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有一位贫农老大爷，
家住临县黄河边。
旧社会生活实可怜，
新社会家里生活甜。
人民公社这几年，
心情舒畅干劲添。
艰巨的任务挑在肩，
生产队当了饲养员。

由于《饲养员之家》反映的内容贴近生活，所用的语言明快上口，发表后曾一度被作为说唱宣传材料，流传于社会。

谈到王易风同志与戏曲的情缘，还得追溯到他的童年。那时，晋西山区的文化生活很贫乏，老百姓所熟悉的艺术形式，除了曲艺说唱、秧歌与道情的表演，就要算大戏了。这个大戏主要指山西的中路梆子戏（晋剧）。晋剧有说有唱，更有完整的情节，再加上它那色彩斑斓的服饰、生动奇特的脸谱，很吸引人。王易风对它也情有独钟，每逢山村庙会有晋剧戏班演出，他总要想方设法去看个够。久而久之，他不但记住了戏里感人的故事，而且心血来潮时还能像模像样地吼几嗓子。后来到了剧社，正赶上剧社也要排演晋剧，于是有惊人记忆力和一副好嗓子的王易风，理所当然地成了演员的首选，粉墨登场演起了戏。

起初，他只是出于对敌斗争需要，服从组织安排而为之，谁知一发而不可收，他竟很快成了剧社唱“红”（须生）的主角，诸如《打金枝》中的唐王、《斩黄袍》中的赵匡胤，《出棠邑》中的伍子胥、《辕门斩子》中的杨六郎、《蝴蝶杯》中的田云山、《失空斩》中的诸葛亮、《反徐州》中的徐达、《芦花》中的闵德仁、《正气图》中的刘伯温等，他都能演得绘声绘色

栩栩如生，甚至还出现过他不上场观众就不散的情景。对此，与他共同战斗过的山西著名作家胡正同志曾说，王易风已成了当时晋绥边区的名演员，不仅同行欣赏他的演唱，不少群众也知道王易风是个唱戏的好把式！

不过他的这个好名声得来却并不容易。俗话说“三十不学艺”，戏曲界的行话也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都是学艺之难。此时的王易风已年近30，虽然自幼热爱戏曲，却从未登台献艺，更没有练过一天戏曲基本功。在台下你可以坐在那里甚至闭上眼睛去唱，只要梆板尺寸（节奏）不乱即可。在台上则必须根据剧情的发展做到眉眼表情、抬手动脚处处到位，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对王易风来说，要做到这些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他没有知难而退，而是牢记领导所指示的“唱戏也是抗日，为了革命，干部要起带头作用”的话，每天黎明即起，练念白，练演唱，踢腿，拉架子，练台步，跑圆场，一直练到能够适应台上的表演。一个半路“下海”的人，能做到这个程度，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付出多少心血啊！

有志者事竟成，他成功了。除了扮演晋剧传统剧目中的须生，他在戏曲艺术上的成功还体现在会唱眉户、能演现代戏。如《王德锁减租》里的赵剥皮，《血泪仇》里的联保主任、黄先生、王仁厚，《标准布》里的刘万山，《张秋林》里的车老三，《大家好》里的张老四等，他都演过。

除了演戏，在战争年月他还创作改编过《大会中原》（合作）、《防旱抗旱》（集体）、《柳林战斗》（话剧，合作）、《东平府》、《史可法守扬州》、《反霸斗争》、《李自成》以及前面提到的《张秋林》（合作）、《落网》、《石达开》、《琥珀珠》、《久旱逢甘雨》、《过年忙》（合作）、《细水长流》（合作）、《破洪州》等，并在晚年参与创作了大型晋剧《于成龙》。其中《大会中原》曾有好几个剧团演出，小戏《落网》也被许多业余剧团搬演，《石达开》曾由著名晋剧演员乔玉仙、赵月楼、傅荣贵等搬上了晋剧舞台。经他参与改编的由丁果仙、牛桂英、郭凤英、王正魁、冀萍联袂演出的《打金枝》，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为舞台艺术片，享誉全国。

以上提到的编演戏剧情况，仅是他与戏剧情缘的一部分。他对戏剧的研究（主要是晋剧）也收获颇丰，主要体现在他的专著《山右戏曲杂记》中。

这部书是他积数十年在晋剧领域的所见所闻及深入调查访问成果，反复研究而成的著述，洋洋 30 万言，立论明确，论据充分，多有独到见解。此外，书中还留存了不少弥足珍贵的晋剧史料，所以这部书又是研究晋剧，特别是研究晋剧史不可不读的专著。

上面提到的是王易风同志艺术成就的主要方面，并不是他的全部。正如有人戏言，说王易风是文艺战线上的“杂家”，这话是颇有道理的。不过这里的“杂”，并非说他杂七杂八，更不是杂乱无章；而是赞誉他的才华，说他是多面手。写诗，并不是王易风同志业余创作的主流，但在留存下来的诗作中，无论是旧体诗还是新诗，都不乏传世佳作，其语言、风格、韵味，都使人回味无穷。至于他那脍炙人口的打油诗，更令人拍案叫绝。

关于他的诗，著名作家李束为曾说：“他的诗可以说是独成一体，既有古诗的严谨，又有新诗的洒脱，还有民歌的清新。这一切与他个人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见《山乡诗话》序）这话是很有见地的。比如《离休抒怀》中有这样的诗句：

粉墨春秋唱乱弹，
声声板话在边山。
平生从未贪权贵，
愿见群黎展笑颜。

此诗既是对当年经历的回顾，又抒发了他一生廉洁为民的情怀，毫无雕琢之感。又如 1982 年冬写的《上中条山》，诗中这样写道：

晨雾茫茫过小桥，
盘旋绕道上中条。
行车忽感红日照，
回首云层在山腰。

以清新、明快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美好大自然的热爱。他的另一首题为《母子情》的诗，明白如话，却又楚楚动人：

小小油灯闪亮光，
老娘年迈坐一旁。
再三嘱托百年后，
埋葬无须乱铺张。

此类旧体诗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了。这里再简要谈一下他的新诗。从广义上看，他的新诗与他的说唱板话关系很密切，但却不是一般的板话；受到过旧体诗的影响，却看不出旧体诗的痕迹。在他留下的新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是《问海》：

是海是洋，
到底有多大容量？
天地间的雨露河流，
全部归你收藏。

您却若无其事，
不声不响，
既不居功自傲，
也不背后喧嚷。

.....

这仅是全诗中的两节，但洗练的语言、铿锵的声韵、潜在的哲理，读来却仍使人耳目一新。

以上是我们对王易风同志一生艺术成就的极为粗略的回顾，没有溢美，没有炫耀，更没有粉饰。但即使这样，一位集戏剧家、曲艺家、名演员、诗